

出塞图卷一



出塞图卷二



屈原赋译注

袁梅译注

山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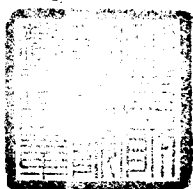


湘夫人



屈原赋译注

袁梅译注



齐鲁书社

一九八三年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67088

967088

屈原赋译注

袁梅译注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13.75印张 302千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书号 10206·79 定价 1.75元

序

袁梅同志著《屈原赋译注》成，他和齐鲁书社的同志让我写一篇序。我想：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大诗人。他大名鼎鼎，为古人和今人所称道，为我国人和外国人所称道。对于他的生平、思想和作品，近人著作如郭沫若的《屈原研究》、何其芳的《屈原和他的作品》，都有较全面的论述，袁梅同志的这本书，也有较全面的论述。这样，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经过反复筹思，我只说一说我阅读屈原作品后的一点儿感想吧。

孟子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结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来阅读屈原作品，我认识到：

一、屈原首先是个有清醒的政治头脑，并能“守死善道”的人，然后才是一个诗人。

在屈原的时代，列国之中，秦楚最强：秦据关中之固，一出关门，亦有居高临下之势；楚疆域辽阔，物产富足；两国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。究竟谁统一中国？问题的关键，在于政治的好坏。秦自商鞅变法之后，废除了贵族领主在经济上、政治上的特权，缓和了阶级矛盾，物产日增，国势日强。而楚自吴起变法失败后，政权操于旧贵族之手，剥削残酷，政治腐败，加甚了阶级矛盾^①。屈原看到这种情形，认为变法图强是楚国的急务。所以他在二十余岁做楚怀王的左徒、得到楚怀王的信任的时候，就锐意变法。在屈原的时代，齐国也是一个强国。

联合齐国以抵抗秦国应该是楚国的正确的外交政策。特别在公元前三一八年（楚怀王十一年、秦惠文王后元七年）楚、魏、韩、赵、燕五国联合攻秦失败后，秦国开始加紧侵略楚国；在公元前三一六年（楚怀王十三年、秦惠文王后元九年）秦遣张仪、司马错吞灭巴、蜀之后，秦国在军事上给楚国以严重的威胁；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，联合齐国以抵抗秦国，对楚国来说就更为必要了。因此，屈原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是很有眼光的。司马徽说：“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”象屈原这样的人，可说是“识时务者”了。有人说：“当中国走向统一的时代，秦将统一，而屈原抗秦，这是拒绝统一，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进程的。”这话说得很好笑。应该弄清楚：问题不是统一和反统一的问题，而是由谁来统一的问题。屈原是楚国人，是楚国的世臣，是楚国的爱国志士，自应要求楚国来统一，而要求楚国来统一，自然要抗秦了，此其一。其次，楚国和秦国原来都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，但到春秋时代，中原的思想和文化渐为楚国所吸收：楚庄王曾对潘党谈到《周颂·时迈》（见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），屈巫曾对楚庄王谈到《周书·康诰》（见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），蒺罢曾在晋平公的宴会中朗诵《大雅·既醉》（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），“孔子西行不到秦”，但他到过楚国，受到楚王的重视（虽然因为他是外来人没有得到重任），都可说明这一点。自从公元前四七三年吴为越所灭之后，楚国势力逐渐向北伸展：公元前四三一年，楚简王灭了莒国，鲁国渐为楚所控制（到屈原死后不久，鲁卒为楚所灭）。齐威、宣之时，竟筑长城以拒楚。这样，齐鲁文化就易为楚人所吸收。陈良被孟子称为“豪杰之士”，曾经“北学于中国”。屈原也曾到过齐国。他说：“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；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！”

(《离骚》)“尧舜之抗行兮，瞭眇眇而薄天；众谗人之嫉妒兮，被以不慈之伪名。”(《哀郢》)先秦诸子中，道、法两家都不重视尧舜，庄子、韩非子甚至认为关于尧舜的传说是后人伪造的。重视尧舜的，莫过于儒家，而屈原对于尧舜如此推崇，可见他受到了齐鲁思想的影响。由于楚国能够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，它的思想文化就有了提高。秦国则不然，它专讲霸道，不重文化，所以它虽变法致强，而当时各国却称它为“虎狼之国”，屈原也是这样称它的^②。因此我们说屈原的抗秦是拯救文化的斗争，也无不可。从屈原坚持变法，坚持联齐抗秦看，他是个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人，是毫无疑问的了。屈原要变法，必然遭受旧贵族的阻挠和破坏，因为变法将削减他们的权益。所以屈原做左徒时造为宪令，草稿尚未写定，上官大夫就想抢走，没有达到目的，就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。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这般人，于是疏远了屈原，不让屈原继续做左徒，而给他一个闲散的差事——三闾大夫，叫他去管教楚国公族屈、昭、景三氏的子弟去了。屈原变法的意图就失败了。屈原要联齐抗秦，也必然遭受到旧贵族的破坏和反对。因为旧贵族们惯于以私害公，又养尊处优，只需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不愿冒着风险与秦国对抗。所以上官大夫、靳尚、楚怀王幼子子兰、楚怀王宠姬郑袖都要走亲秦投降的路线。楚怀王是个昏庸的国君，根本没有一定的外交政策，经过上官大夫等人的包围，他就依违于抗秦、亲秦两种主张之间。到了楚顷襄王时，子兰做了令尹，亲秦投降派的势力更大了，因而屈原抗秦的外交政策也失败了。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，在抗秦与亲秦的斗争中，屈原都失败了，他先后被流放于汉北、江南。倘若他“变心从俗”，向对方妥协，是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的，但是他坚决不这样做。在屈原的时代，

一个有特长的人如果在本国失意，是可以到别国去找出路的。屈原虽是楚国世臣，但被放逐，也可以到别国去找出路^③，而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，坚决不肯这样做。既不能“变心从俗”，又不肯到别的国家去，他只好留在国内被放逐的地方，“负杖行吟，则百忧俱至；块然独坐，则哀愤两集”，他受到了长时间的折磨。忧愤郁结，何以排遣？于是发为诗歌。直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二七八年），秦将白起率兵攻下郢都，烧了楚国王陵，取了洞庭五渚江南，楚国君臣逃到陈城（今河南淮阳）去，他认为楚国没有前途了，于是投汨罗江自杀了。“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；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咸之遗则。”（《离骚》）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可谓“守死善道”的人了。屈原要变法，限制贵族特权，减轻人民负担，自系人民的愿望；屈原要抗秦，根据古籍记载，更符合人民的要求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举出三点根据：第一，“怀王卒于秦，秦归其丧于楚，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第二，白起攻下郢都，不乘势灭楚，反而退兵，这是因为“白起所击溃的是楚国的正规军队”，而当时到处蜂起的民间武力却与白起为难^④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，“秦所拔我江旁反秦”，《楚世家》说这一年“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，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，距秦”。可见白起攻下郢都两年之后，楚顷襄王就利用人民反秦的力量，收集残兵，收复了一些失地。第三，楚“为秦所灭，百姓哀之，为之语曰：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’”（《风俗通义·皇霸篇》）从这三点根据看，屈原要抗秦，虽为旧贵族、亲秦投降派所反对，却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。屈原在白起攻下郢都之后，就认为楚国没有前途了，这是因为他只把希望寄托在国王、统治阶级的身上，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力

量。这是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。但我们对古代作家及其作品，不能要求其超越这种局限，而应当汲取其好的东西，有益于今的东西，例如屈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，并能“守死善道”，决不向腐朽势力妥协，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吗？

二、屈原的作品，是紧密结合他的身世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、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作品。

屈原的作品紧密地结合着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、环境，这一点在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里的屈作^⑤中是显而易见的。现在只摘录其中的一些句子来看看：

已矣哉！国无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怀乎故都？既莫
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——《离骚》

所谓“美政”显系指变法而言。后人所作的《惜往日》云：“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嬖。”正可为“美政”的注脚。

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岂余身之惮
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

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为常。虽体解吾犹
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！——《离骚》

这正是屈原热爱祖国、坚决斗争、“守死善道”的说明。

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——

《九章·桔颂》

这表面是赞美桔树，实际是以桔自比，说自己虽被放逐，而决不背离祖国。

《九歌》是经过屈原更定的楚人的祭歌，从表面看，好象与屈原的身世无关，细读强探，就会感到其中透露一种不可掩抑的更定者的情绪。例如《东君》：

青云衣兮白霓裳，举长矢兮射天狼。操余弧兮反
沦降，援北斗兮酌桂浆。

俞平伯先生解释说：

穿着云霞的衣裳，举起天上的弓箭，射倒那变幻
的天狼星，然后功成身退，拿北斗的勺子大啖其酒，
这何等的痛快淋漓，兴高采烈。

他说，“举长矢兮射天狼”，表明东方的太阳星用
天上的弓箭来讨伐魔鬼。魔鬼很多，什么不好说，定
要用这天狼。原来古代天文地理学者说天狼星属东井，
正照秦地，代表秦国的呵。⑥

由此可见，屈原的抗秦是坚决的，他渴望着抗秦的胜利。明人
陈第自言读屈作，最喜《九歌》，因为《九歌》“虚以寓实”，“词
藻之妙，操觚摘采者既模拟而莫之及”。当于此等处见之。

屈原的作品既是紧密地结合着他的身世的，则其中自必洋
溢着作者的真实的情感，对读者自必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。王
逸《离骚经序》中说：“《离骚》之文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。
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，恶禽臭物以比谗佞，灵脩美人以媲于君，
宓妃佚女以譬贤臣，虬龙鸾凤以托君子，飘风云霓以为小人。
其词温而雅，其义皎而朗。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，嘉其文采，
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。”王逸的话正道出屈作有所继承和它的强
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关于屈原作品的继承和创新，袁梅同志的这本书颇有所论
列。我在这里只就三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：1、创作冲动。这里
所谓创作冲动，指诗之所由作而言。卫宏《毛诗序》说：“情动
于中而形于言。”可见写诗必先有真挚的情感。而人之情感，必
“感于物而动”（朱熹《诗集传序》），可见写诗必是“感物吟志”，

出于自然。古代民歌，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（宣十五年《公羊解诂》），都出于自然。屈原继承了这个传统，其诗紧密地结合身世，所以言之真切，富有感人魅力。2、创作方法。古代民歌多用比兴，比兴基本是形象语言。写诗不一定用形象语言，但感人至深者，形象语言为多，所以诗家多重比兴。用比兴，可使形象显明，可使诗情蕴藉，耐人寻味，且能显示作者“感物吟志”，不得已而写诗，并非无真情实感而硬要写诗。屈原吸收了民歌用比兴这一特点，而且他的诗是浪漫主义的诗，要虚构，要写很多超现实的事物，他用比兴比较他以前的诗歌有所发展，使读者感到突出。唐人诗宗风骚，也多用比兴。胡应麟特别欣赏《湘夫人》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恍忽兮远望，观流水兮潺湲”。他说：“唐人绝句千万，不能出此范围，亦不能入此阃域。”（语见《诗薮》）这几句就是用比兴手法写的，“兴发于此，义归于彼”。所以使读者感到很有意味。3、诗的体裁。在上古，文学作品就有两种：其一是诗歌，如《诗经》；其二是散文，如《书经》。这两种文学作品，虽被区分成两种文体，但未尝不可以相互通流，相互渗透。例如《诗经》是诗歌，而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”（《周南·关雎》）“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一何哉！”（《邶风·北门》）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”（《鄘风·桑中》）“仲可怀也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！”（《郑风·将仲子》）……用了一些散文句法。出于战国时期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是诸子散文中的名作，而《老子》八十一章颇有诗歌的韵味，《庄子》亦每用韵语，如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（读堵）；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（读虎）；中于机辟，死于网罟……”（《逍遥游》）“无入而藏，无出而阳，荣立其中央。”（《达生》）“巧者劳而知者忧，无能者无所

求，饱食而敖游，汎若不系之舟。”（《列御寇》）这种诗文相互通流、渗透的情况，发展到战国末期，被屈原继承并加以扩充，就形成了他的不朽的糅合诗文句法的浪漫主义诗篇。我们可以说这种诗篇是散文诗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散文诗是由屈原开创的。历代诗论家，常称屈原的这种诗为“骚”，因他的代表作《离骚》抒写作者忧愤的情感，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，洋洋洒洒，“忽起忽伏，忽断忽续”（用王邦采《离骚汇订·自序》语），独具一种风格。屈原的“骚”，对后世很有影响，就体裁而言，它不独是古代诗歌的扩展，而且是宋玉以后的“赋”的前驱。《汉书》称之为“赋”是有道理的。后人如胡应麟、刘师培等，只知赋是要铺张的，而不知“骚”也有铺张^⑦。铺张不铺张，要从比较中看：“赋”之铺张固过于“骚”，“骚”之铺张亦过于“诗三百”。从发展上看，诗、骚、赋三者是一脉相通的。所以刘勰著《文心雕龙》，其《辨骚》一篇，专论屈作，而《明诗》、《诠赋》两篇亦涉及屈作。《辨骚》中的话：“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，而风杂于战国，乃《雅》《颂》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。”^⑧说得多末切当啊！

严羽论学诗，说：“学其上仅得其中，学其中斯为下矣。”又说：“工夫须从上做下，不可从下做上。先须熟读《楚辞》，朝夕讽咏，以为之本……”^⑨元稹说杜甫的诗“上薄《风》《骚》”^⑩，杜甫亦自言：“窃攀屈宋宜方驾。”^⑪可见学诗，就要读屈作，细加揣摩。我看，我上面所提屈原及其作品的特点，是值得借鉴的。

袁梅同志的书，为初学屈原作品的人提供了很好的读物，对屈原研究者来说，也是值得参考的。严复译西文，提出三个标准：信、达、雅。我看，译文只要作到信、达就可以了。苏

轼说：“词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”这话说得很好。词至于达，则“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（引文见《答谢民师书》）。不求“雅”而实已“雅”了。袁梅同志的译文，在“信”字上很下工夫，作得也较好；在“达”字上似犹有未尽，希望能够作进一步的探索、琢磨。

庄 维 石

注

① 苏秦曾对楚王说：“今王之大臣父兄……厚赋敛诸百姓，使王见疾于民。”见《楚策》。白起也曾说楚王“不恤其政”，“谄谀用事，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”。见《中山策》。

② 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。

③ 宣元年《公羊传疏》：“古者放臣，任其所去。”《癸巳类稿·书鲁语后》：“世臣非被逐不得弃宗庙外游。”

④ 参考郭沫若《屈原考》，载《蒲剑集》。

⑤ 我认为《九章》里的作品，不尽是屈原所作。如《惜往日》云：“临沅湘之玄渊兮，遂自忍而沉流。卒没身而绝名兮，惜壅君之不昭。”显系后人口吻。

⑥ 见俞作《屈原作品选述》，载1953年6月15日《文汇报》，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的《楚辞研究论文集》收入。

⑦ 胡应麟《诗薮》说：“骚与赋体裁不同，骚以含蓄深婉为尚，赋以夸张宏钜为工。”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说：“循名责实，惟记事析理之文可赐赋名，自战国之时，楚骚有作，词赋比兴，亦冒赋名，而赋体始淆。”

⑧ 博徒多取，故以言铺张。

⑨ 见《沧浪诗话·诗辩》。

⑩ 见元稹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》。

⑪ 见《戏为六绝句》之五。

引 言

一、“楚辞”的产生与发展过程

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，最初兴起的灿烂明星，是第一部乐歌总集——《诗经》；踵继《诗经》而兴起的又一颗明星，便是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“楚辞”。它打破了诗坛上《诗经》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大放异彩。它不仅照耀着“楚辞时代”的诗歌发展道路，而且历两千余载仍不稍减其光辉。

（一）“楚辞”的名称

“楚辞”，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、具有楚语和楚音特征的、富于地方色彩和楚地民歌传统的一种新兴文学样式。又因其中的代表作是屈原的《离骚》，所以也称“骚体”。（按：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引黄伯思《翼骚序》云：“屈原诸骚皆书楚语、作楚声、纪楚地、名楚物，故可谓之楚辞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诎、蹇、纷、佗、傺者，楚语也；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，楚声也；沅、湘、江、澧、修门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兰、茝、荃、荪、蕙、若、芷、蘅者，楚物也。”黄氏说出了“楚辞”的一些特点，可供参考。）

西汉末季，刘向将屈原、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（并附加他仿作的一篇《九叹》），以“楚辞”名之，自此，“楚辞”又成了这部诗歌集的专名。沿至东汉，王逸给“楚辞”作注，辑成

《楚辞章句》一书（并增入自作《九思》一篇）。

“楚辞”之名，最早见于《史记·张汤传》和以后的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，二者俱载朱买臣以能言“楚辞”而见宠于汉武帝；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曾称述枚乘、淮南王刘安、严助、朱买臣之属传习“楚辞”；《汉书·王褒传》也言及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“楚辞”之事。此外，“楚歌”之名，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、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中都有记载。

“楚辞”的出现，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次大解放、大创新、大进步。它植根于楚地民歌，又高超于楚地民歌。不仅在思想性、艺术性方面由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；而且还有一个显著标志：由原来的无主名、集体口头创作进到有主名、有个性的作家艺术创作。两千二百年前，戴上桂冠而特立于我国古代诗坛的有主名的诗人便是屈原。

我们现在研究“楚辞”，主要对象是屈原的作品，因为他是“楚辞”这种文人诗歌的创始者和代表者，只有他的作品真正体现了“楚辞”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。

（二）“楚辞”的先河——“二南”、

有韵铭文、楚地民歌

《诗经》有“十三国风”，又有“二南”（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）。虽然通常是将“二南”并入“国风”，习称“十五国风”，但是“二南”毕竟是一种独特的乐歌。“十三国风”，基本是黄河流域的乐歌；“二南”，基本是楚地的乐歌。除《周南·汉广》、《召南·江有汜》以汉水、大江名篇可确认为楚歌外，其他许多作品的风格也跟这两篇相近，而与“十三国风”有异。况且，“南音”，“南风”、“南乐”之称，早已见诸《左传》成公九年、襄公十八

年及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的记载。“二南”，实即“南风”、“楚风”、“楚歌”之异称。它是汝、汉、沱、江一带（春秋以后楚国国土）的地方乐歌。“周”、“召”各为地区之名，“南”是诗体乐调之谓。“二南”大约产生在周平王东迁（即公元前八世纪）以后，当时，楚地在经济繁荣，物产丰富的条件下，文化艺术也非常发达，特别是在乐、舞、诗歌方面，芳华竞发。在《诗经》四体中，“二南”的创作年代较晚，但是后来者居上，其中有很多进步而新颖的佳构。它也同“十三国风”一样，是在地方民间口头歌谣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提高，又经过乐官、文学之士整理加工，录而传习的。尽管经过加工润色之后，它的地方色彩已不象“楚辞”那样浓重，但它还是保留着一些“楚语、楚声、楚地、楚物”的痕迹的。如明言“江”、“汉”、“汝”、“沱”等楚水之名；又如《周南·葛覃》、《螽斯》、《麟之趾》、《野有死麋》，《召南·摽有梅》等乐歌中运用的语词“兮”，《周南·汉广》中运用的语词“思”，都是楚语楚声；又有“雝雝”、“黄鸟”、“螽”、“草虫”、“鲂鱼”、“葛”、“蓢”、“荇菜”、“卷耳”、“梅”、“唐棣”等楚物之名。……由此可见，“二南”确实是“楚辞”的先河。

“楚辞”是在楚地乐歌“二南”的流风余韵中发展提高、日臻成熟的，它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，是我国古代汉文学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波峰。它不但继承并发展了“二南”的优秀传统；而且祖述并发扬了“十三国风”的优秀传统。它既是战国时期南、北文学艺术传统的合流融汇，同时又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独特风格。

除“二南”收录的“楚地乐歌”而外，楚地民间歌谣有其悠久的渊源，据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载：“禹行功，见涂山之

女。禹未之遇，而巡省南土。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。女乃作歌，歌曰：‘候人兮猗！’实始作为南音。……”人物传说的真实性暂置不论，我们不妨将这质朴的歌辞视为“南音”的滥觞。迄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整个中国出现了文化艺术繁荣兴旺、百花争艳的新局面，第一流的作家与作品，有许多产生在以江、汉流域为中心的楚地。仅就诗歌而言，至公元前四世纪屈原降生之时，在长江中、下游广大南方地区，已有丰富而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在汇集、发展着，它们继“二南”之踵武，成为“楚辞”的先驱。首先，在古代青铜器上，保留了一些有韵的、歌谣体的铭文，如公元前八世纪初的《楚公逆罇铭》：“夆和八亢，□占纯公。逆其万年又寿，□保其身，孙子其永宝。”按：罇乃乐器，或为锄田器。此“楚公逆罇”，当为乐器。据郭沫若先生考证，其文乃是韵语，“亢公，阳东合韵。寿宝，幽部”。楚公之名，“孙诒让释为逆，谓即熊罴”（所引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）。稍后，有《说苑·至公篇》所载公元前七世纪中期的《子文歌》：“子文之族，犯国法程，廷理释之，子文不听。恤顾怨萌，方正公平。”又有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所载的《楚箴》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（按：此文无韵，恐有泐损。因古代箴文多有韵。）又有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所载《优孟歌》：“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；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。贪吏而不可为者，当时有汙名；而可为者，子孙以家成。廉吏而可为者，当时有清名；而不可为者，子孙困穷，披褐而卖薪。贪吏常富，廉吏常苦贫。独不见楚相孙叔敖，廉絜不受钱？……”又有《说苑·正谏篇》所载《楚人歌》：“薪乎，菜乎！无诸御己，迄于子乎！菜乎，薪乎！无诸御己，讵无人乎！”（按：这是赞美一位农夫以机智的语言来阻止封建庄园主做坏事的歌，它和《优孟

歌》大约都作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。)沿至公元前六世纪——前五世纪,逐渐产生了新的歌辞,如《新序·节士》所载《徐人歌》、《说苑·善说》所载《越人歌》、《左传》哀公十三年所载《庚癸歌》、《论语·微子》所载《接舆歌》、《孟子·离娄》所载《孺子歌》,等等。这些歌辞,考其创作年代,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之间。其中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的,如《越人歌》:“今夕何夕兮,搴舟中流?今日何日兮,得与王子同舟?蒙羞被好兮,不谔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,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,木有枝;心悦君兮,君不知!”这是一首语言优美含蓄、富有音乐美的抒情诗。又如《接舆歌》:“凤兮,凤兮!何德之衰!往者不可谏;来者犹可追。已而,已而!今之从政者殆而!”再如《孺子歌》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至于《招魂》中提及的《涉江》、《采菱》、《阳荷(阿)》,《大招》中所说的《劳商》,也都是楚曲之名。以上所举不同类型的歌谣,大半是春秋末至战国初,长江流域的民间口头创作。同时,在楚国南部的沅、湘一带,以及楚国的西部、北部,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大量的民间乐歌。纵然它们还未达到“楚辞”那样圆满成熟的地步,但是,它们的句式灵活多样,参差错落;也有韵律美;恰当地运用双关语以及“兮”、“思”、“猗”等语气词;有的则洋溢着抒情气氛。这些民间乐歌,已较前代大大进步和解放了,它们不愧为“楚辞”的前导。

(三) 从民间祭神舞曲到《九歌》

楚民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,自春秋以降,其国土日渐扩大,幅员辽阔,物产富饶,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兴盛发达,国家日益富强。经济的飞跃,促进了文化的繁荣。楚地之俗,“信鬼而